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代理成本效应 与声誉效应的双重检验

朱 荣,李 霞

(贵州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选取 2008—2018 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分析了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检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但代理成本起主导作用,声誉效应可抑制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内部控制较差,但这与高管的任职年限有关,职业经理人任职年限更长,内部控制状况更好,但同时代理冲突也在增加。因此,家族企业在选任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者时,应多关注其带来的代理问题,进行利益权衡,同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治理。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审计费用;代理成本效应;声誉效应;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审计质量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0)04-0038-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随着家族企业“创一代退休潮”的来临,如何选择“接班人”是家族企业面临的重大抉择,也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从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代理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2]。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家族企业无论是任用家族成员还是聘用外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均会产生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代理问题。任用家族成员时因目标函数的高度一致性使企业面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较低,但高度集中的股权模式使大股东利用手中绝对控制权,通过关联方交易、占款等“隧道行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进而加剧了第二类代理问题^[3]。聘用职业经理人时由于外部人的介入导致企业两权分离,不信任与自利行为的存在加剧了企业面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损害了企业的利益^[4-5]。但管家理论的代表者田银华等认为人是“社会人”,经理人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职业经理人受社会动机与成就动机的驱动,会尽职尽责的当好企业的“大管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维护企业利益,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6];同时职业经理人的专业化经营有助于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的绩效与公司价值。而从职业经理人自身来看,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状况,为了获得委托人与业界的认可,更加重视自身声誉的提升,进而对企业产生有利影响^[7]。

根据以上分析,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有利有弊,但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一问题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从审计费用角度出发,探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为厘清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路径与影响关系,本文选取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 2008—2018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从代理成本效应和声誉效应出发,探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厘清两者的影响路径,不仅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职业经理人的研究范畴;第二,本文构建了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检验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何

[收稿日期]2019-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14XYJ019)

[作者简介]朱荣(1979—),男,贵州毕节人,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会计、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E-mail:11635753@qq.com;李霞(1995—),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研究。

①瑞信研究所 2017 年发布的家族企业报告显示,家族企业占据了内地私营企业 85.4% 的市场份额,其对我国 GDP 贡献超过 65%,提供了超过 60% 的就业机会。

种效应发挥作用,进一步验证了职业经理人对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的作用,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家族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主体,在创一代纷纷退休之际,选择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的继任者成为创一代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审计费用这一视角切入,关注任用不同类型的管理者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审计成本,为创一代决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家族企业任用外部经理人,与任用家族经理人相比,其在面临的代理成本、内部控制状况方面会存在差异,审计师在此情况下面临的审计风险也会有所差异,如果审计师能辨别这种风险,则在审计业务过程中有可能进行区别定价。本文认为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可能存在两条相反的作用路径。一方面,基于传统的代理理论,职业经理人的介入导致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于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代理问题加剧,增加了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才能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认定,审计收费增加^[4]。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是通过经理人市场竞争选聘而产生的,经理人作为“供给方”,企业作为“需求方”,决定经理人能否被聘用的原因除了自身专业能力和努力程度以外,还需要考虑经理人长期在业内所建立起来的职业声誉。基于 Fama 的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经理人为得到业主的认可与社会的尊重,将会更认真地工作,在经营管理方面亲力亲为,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减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避免自己的职业声誉受损^[8]。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内部控制越完善的企业其审计风险越低,将会执行更少的审计程序,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

(一)代理成本效应

职业经理人是通过外部经理人市场的竞争选聘机制产生的,其与企业所有者之间主要是委托代理关系,受业主的委托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根据 Jensen 的研究,职业经理人的介入导致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并希望其尽可能地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4]。而根据“经济人”假设,人所做的选择是基于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职业经理人的目标则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导致所有者与经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职业经理人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职高消费、挪用资产、贪污公款等自利行为频现,导致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日益凸显,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带来的代理成本也随之上升。严重的代理冲突对企业的融资状况、投资效率等方面产生影响,罗明琦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越严重^[9]。刘胜强的研究表明严重的代理成本还会影响的企业创新,甚至使企业面临融资约束^[10]。另外,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与其经营业绩直接挂钩,经营业绩越好,薪酬水平越高。在此条件下,经理人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会通过提前确认收入、延迟确认损失等盈余操纵手段改变真实业绩,而过度的盈余操纵影响企业未来的预期收益,损害企业利益^[11]。综上分析可知,聘用职业经理人会加剧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而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

严重的代理冲突会使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股东为了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失,便产生了对外部审计的需求,通过聘请第三方审计师对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约束。张利红等也认为外部审计已被广泛地当作是缓解代理成本的有效方式^[12]。当企业的代理问题越严重时,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越大,越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审计,通过外部审计来发现管理层存在的问题。现代审计以风险导向为原则,审计师不仅需要审计出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控制风险、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等,还需要关注审计业务给审计师自身带来的审计失败风险,以及对自身名誉和事务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已有学者发现,企业持有自由现金流比例越高的公司,其代理问题越严重,审计师对这类企业需要额外关注,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和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因而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蔡春等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其盈余操纵的幅度越大,审计费用越高^[13]。这也可以从审计风险规避的角度进行解释,当企业的代理问题越严重时,企业存在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会被相应的高估,审计师为了降低重大错报风险,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努力,承担更高的审计风险,因此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基于聘用职业经理人-代理成本增加-审计收费增加的分析路径,本文认为,代理成本的增加加剧了审计师在审计业务过程中面临的审计失败风险,而审计师需要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和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以确保股东对外部审计的高质量需求——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和降低自身的审计失败风险,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基

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产生的代理问题越严重,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

(二) 声誉激励效应

职业经理人的介入导致企业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促使家族企业面临的代理冲突加剧,这在 Jensen 和 Meckling^[4]、李寿喜^[14]、吕长江和周县华^[15]等人的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但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其间可能存在另一作用路径。

市场上存在供需双方,经理人市场也如此。职业经理人作为“供给方”,家族企业作为“需求方”。家族企业选择职业经理人时不仅会考虑经理人具有的专业能力,还会考虑经理人在业内的声誉。经理人的声誉是其经过长期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积累起来的稀缺资源,在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难以被复刻和取代^[7]。已有研究表明,当职业经理人更加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将会更努力地在经理人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16]。声誉逐渐成为经理人的—种隐性激励方式,具有良好声誉的经理人在预期内可获得更多的潜在收益,如晋升、社会定位、社会认可度等。不仅如此,职业经理人学习过系统的管理知识,对企业的运营管理不仅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有大量的实战经验,形成了一套专业管理理念等,可以带领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高厚山等人的研究还发现越爱惜自己声誉的管理层,越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运行状况,公司运行中暴露出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会滋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进而对经理人的声誉以及职业前景带来严重的影响^[17]。辛清泉等的研究也表明公司管理层会由于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而被监管机构问责,导致其声誉受损^[18]。而更加重视声誉的经理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他们追求的除了经济利益外,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保护企业与投资者资产的安全性,会如同一个“大管家”一样尽职尽责的努力工作,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换言之,声誉对经理人产生鞭策效应,促使其更加重视公司治理,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避免“声誉风险”的发生。因此,基于声誉的激励效应,经理人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良好。

公司自身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是保证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有效的两种治理机制,良好的公司内部控制行为能够有效减少盈余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由欺诈或错误引起的虚假财务报告,进而降低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已有学者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萨班斯法案颁布前后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在 SOX 法案颁布之前,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行为应对之间无相关关系^[19];但在 SOX 法案颁布之后,研究发现审计师会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进行区别定价,内部控制披露重大缺陷和被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被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20]。我国在 2008 年由五部委联合发布《内部控制指引》后,内部控制体系随之被建立起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考察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缺陷程度越严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越大^[23]。内控缺陷严重的企业,其面临的经营风险与控制风险增加,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原则,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增加,审计师在进行业务审计时会额外关注内控失效产生的经营风险与控制风险,进而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22]。换言之,内部控制越完善的企业,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被收取的审计费用更低。

基于“聘用职业经理人—内部控制越完善—审计费用降低”的分析路径,本文认为,聘用职业经理人会由于声誉的激励效应,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相应地,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也较低,进而执行相对较少的审计程序,审计投入也相对较少,因此被审计单位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其内部控制越良好,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可能通过代理成本效应和声誉效应两条相反的路径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综合影响,究竟是代理成本效应的作用还是声誉效应的作用,有待实证结果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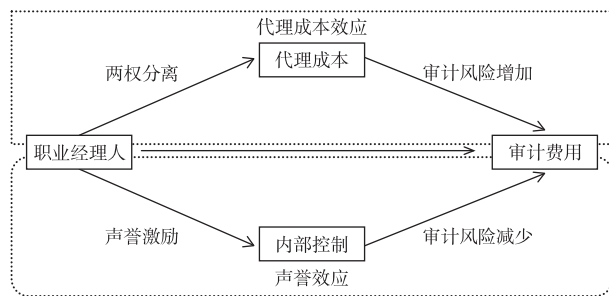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作用路径图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18 年沪深两市的家族企业^①作为研究对象,并剔除由员工持股或工会控制的家族企业。与此同时,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ST 企业(ST、*ST)与 PT 企业;(2)剔除变量的异常值;(3)对连续变量进行 1% 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 6130 个样本。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以及宏观数据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数据来自于 DIB 数据库。本文运用 Stata15.0 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 变量定义与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年度支付的总审计费用(*fee*),为缩小数据的绝对值太大而引起的差异以及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取其滞后一期的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职业经理人(*Prom*),属于虚拟变量,其中包含两个层级,董事长层级(*President*)与总经理(*CEO*)层级。根据家族企业披露的数据,当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为非家族成员时定义为职业经理人,取值为 1;当董事长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非实际控制人的家族成员时为非职业经理人,取值为 0;当家族企业的 CEO 为非家族成员时定义为职业经理人,取值为 1;当 CEO 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非实际控制人的家族成员时为非职业经理人,取值为 0。

3. 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LnICQ*)。该指标由 DIB 数据库提供,根据 DIB 数据库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为防止数值过大引起较大的差异,本文取该指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该披露指数越高时,表明该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越好,反之,该指数越低时,公司内部控制状况越差。

代理成本(*AC*)。根据曹琼等的研究^[23],本文选择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为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

4. 控制变量

本文在已往研究基础上,从被审计单位状况、审计风险、公司治理、事务所特征、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拟解决模型设定中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主要包括公司规模(*Size*)、企业杠杆(*LEV*)、应收账款占比(*AR*)、存货占比(*Inv*)、内部控制缺陷(*ICD*)、两职兼任(*Both*)等。除此之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与较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收取的审计费用较低,因此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与地区发展水平纳入控制变量之中。具体的控制变量以及定义方式见表 1。

(三) 模型设定

1. 审计收费模型

本文构建模型(1)检验职业经理人对审计收费的综合影响。

$$fee = \alpha_0 + \alpha_1 Prom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1)$$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何种效应在发挥主导作用,本文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过程,建立关于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模型(2)—模型(4)为代理成本效应检验模型,模型(5)至模型(7)为声誉效应检验模型。

$$fee = \alpha_0 + \alpha_1 Prom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2)$$

^①家族企业定义为:(1)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是单个自然人且无家族亲属在上司公司或控股股东公司持股/任董监高的企业;(2)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多个自然人,但是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亲属关系,且无亲属在上司公司或控股股东公司持股/任董监高的企业;(3)除实际控制人之外,至少 1 名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控制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公司的企业。

$$AC = \beta_0 + \beta_1 Prom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3)$$

$$fee = \gamma_0 + \gamma_1 Prom + \gamma_2 AC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4)$$

$$fee = \alpha_0 + \alpha_1 Prom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5)$$

$$\ln ICQ = \beta_0 + \beta_1 Prom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6)$$

$$fee = \gamma_0 + \gamma_1 Prom + \gamma_2 \ln ICQ + \sum \beta_{1+i} Controls + \varepsilon_i \quad (7)$$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①。审计费用(*fee*)的最大值为17.31,最小值为11.51,均值为13.58,标准差为0.58,与刘颖斐等的研究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较为一致^[22],同时数据表明样本公司审计费用在不同行业与不同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表2可知,董事长(*President*)的均值为0.205,表明有20.5%的上市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CEO的均值为0.557,表明有55.7%家族企业的CEO为职业经理人;该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任职情况较为一致,董事长多为实际控制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家属,而家族企业的总经理则偏向于聘用外部经理人执行战略决策。代理成本(*AC*)的均值为0.112,最低值为0.002,最大值为2.435,表明代理成本在不同的公司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内部控制指数(*LnICQ*)的均值为6.475,最小值为4.858,最大值为6.869,从该数值可以看出上市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差异不大,且内部控制较好。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综合来看属于正常值,只不过因为行业、个体规模等因素,在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 回归分析

1. 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总效应检验

表3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的总效应检验结果,表3的第(1)列至第(3)列为董事长层级的检验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未对行业和年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控制,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即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被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第(2)列加入了行业和年度的控制变量,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3)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在5%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系数降低。董事长层级的回归结果显示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3的第(4)列至第(6)列为CEO层级的回归结果,同样的,第(4)列是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

表1 控制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定义及衡量方式
<i>Size</i>	公司规模	取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i>Inv</i>	存货占比	企业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
<i>AR</i>	应收占款占比	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比例
<i>LEV</i>	企业杠杆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i>Growth</i>	公司成长性	营业收入减去上一期营业收入的差值与上一期营业收入之比
<i>AT</i>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余额
<i>ROE</i>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i>Age</i>	企业年龄	(会计截止年度日期-企业成立日期)/360
<i>Worker</i>	员工总人数	以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i>LnMana</i>	管理层持股比例	公司管理层占公司股份的比例
<i>Preshrt</i>	董事长持股比例	董事长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
<i>Hdirrt</i>	总经理持股比例	总经理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
<i>ICE</i>	内部控制有效性	企业出具的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若内部控制有效取值为1,无效则为0
<i>ICD</i>	内部控制缺陷	企业出具的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若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取值为1,否则为0
<i>Op</i>	审计意见	若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
<i>Big4</i>	国际四大审计	由国家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家族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i>Both</i>	两职兼任	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否则为0
<i>Famsty</i>	家族化方式	若企业的家族化方式为直接创办则取值为1,否则为0
<i>EB</i>	股权制衡指标	第2-5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SRW</i>	两权分离率	实际控制人拥有所有权比例/控制权比例;该指标从家族整体角度来分析
<i>Indepth</i>	独立董事占比	独立董事占公司董事总数的比例
<i>eu</i>	环境不确定性	借鉴申慧慧的研究 ^[24] ,计算环境不确定性
<i>GDP</i>	地区发展水平	以各地区当期的经济增长率衡量地区发展水平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p50	min	max
<i>fee</i>	6130	13.58	0.580	13.53	11.51	17.31
<i>CEO</i>	6130	0.557	0.497	1	0	1
<i>President</i>	6130	0.205	0.404	0	0	1
<i>AC</i>	6130	0.112	0.097	0.093	0.002	2.435
<i>LnICQ</i>	6130	6.475	0.142	6.498	4.858	6.869
<i>Size</i>	6130	21.235	1.038	22.2	19.95	26.35
<i>Lev</i>	6130	0.405	0.191	0.401	0.007	0.989
<i>ICD</i>	6130	0.245	0.430	0	0	1
<i>Op</i>	6130	0.985	0.124	1	0	1
<i>Big4</i>	6130	0.024	0.155	0	0	1
<i>Both</i>	6130	0.333	0.471	0	0	1
<i>eu</i>	6130	1.217	0.966	0.963	0.029	12.53
<i>GDP</i>	6130	7.64	0.732	7.6	6.09	9.43

①限于篇幅,仅列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表格留存备索。

关系;对行业和年度进行控制之后仍显著,如第(5)列所示;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如第(6)列所示,结果在5%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显著性下降。通过对两个层级的高管进行检验后发现,家族企业的高管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检验^①。

2. 两种效应检验分析

表4为董事长层级的两种效应检验结果,第(1)列是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的回归结果,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和第(3)列为代理成本效应的回归结果,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我们认为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会增加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进而使审计费用增加;第(2)列的结果显示职业经理人与代理成本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即家族企业的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其代理成本更高;第(3)列检验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否是受代理成本的作用,加入代理成本变量后,董事长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标准,董事长是否为职业经理人和代理成本的符号一致且显著相关,表明代理成本在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4)列至第(6)列为检验声誉效应的结果,第(4)列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的回归,在此不再赘述;第(5)列结果显示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与内部控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即聘用职业经理人时企业的内部控制相对较差;第(6)列为加入内部控制的回归结果,显示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在5%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在5%的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聘用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相对于未聘用职业经理人的企业代理成本较高,其内部控制质量同时较低;但根据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越好,审计费用越低。但由于在家族企业中,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较差,从而使得审计费用较高。因此,根据两种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代理成本效应发挥主导作用。

表5为CEO层级的两种效应检验结果,第(1)列是CEO为职业经理人的回归结果,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第(2)列和第(3)列为代理成本效应的回归结果,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我们认为家族企业的CEO为职业经理人会增加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进而使审计费用增加;第(2)列的结果显示职业经理人与代理成本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即家族企业的CEO为职业经理人,其代理成本较高;第(3)列检验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否是受代理成本的作用,加入代理成本变量后,CEO是否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标准,CEO是否为职业经理人和代理成本的符号一致且显著相关,表明代理成本在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4)列至第(6)列为检验声誉效应的结果,第(4)列为职业经理人(CEO)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结果

表3 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主效应回归结果

	董事长层级			CEO 层级		
	(1)fee	(2)fee	(3)fee	(4)fee	(5)fee	(6)fee
_cons	13.574 *** (0.01)	13.065 *** (0.06)	9.925 *** (0.14)	13.554 *** (0.01)	13.040 *** (0.06)	9.910 *** (0.14)
President	0.044 ** (0.02)	0.044 ** (0.02)	0.027 ** (0.01)			
CEO				0.052 *** (0.01)	0.048 *** (0.01)	0.028 ** (0.0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²	0.001	0.169	0.585	0.002	0.170	0.585
N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注:***、**、*分别表示1%、5%、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表4 两种效应在董事长层级的检验结果

	代理成本效应			声誉机制效应		
	(1)fee	(2)AC	(3)fee	(4)fee	(5)LnICQ	(6)fee
_cons	9.925 *** (0.14)	0.263 *** (0.04)	9.860 *** (0.14)	9.925 *** (0.14)	5.627 *** (0.25)	9.772 *** (0.27)
President	0.027 ** (0.01)	0.013 *** (0.00)	0.024 * (0.01)	0.027 ** (0.01)	-0.021 *** (0.01)	0.028 ** (0.01)
AC			0.249 *** (0.07)			
LnICQ						-0.027 ** (0.0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²	0.585	0.328	0.586	0.585	0.250	0.585
N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①限于篇幅,仅列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

不再赘述。第(5)列结果显示 CEO 为职业经理人与内部控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即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内部控制较差;第(6)列加入内部控制后检验声誉效应是否存在,结果显示 CEO 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在 5% 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在 1% 的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越好,审计费用越低。CEO 层级的检验与董事长层级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根据董事长层级和 CEO 层级检验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是代理成本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还是声誉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的回归结果来看,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讨论其作用机制的结果显示:与未聘

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相比,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家族企业,其代理成本相对较高,内部控制较差,使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加,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但是结果同时表明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越好,审计费用越低。因此在这两种效应中,代理成本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由于代理成本的增加导致审计费用增加;但是当职业经理人更加重视内部控制、完善内部控制建设时,会减少审计费用。

五、进一步讨论

(一) 分组检验:内控差异

前文的分析得出,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中,主要由于代理成本效应的存在促使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但是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也发现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该结果,本文将内部控制按行业中位数进行分组,分为高内控组和低内控组,进一步讨论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低内控组,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时,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为明显,总经理组在 10% 的水平上正相关,但是在高内控组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表明较低的内部控制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费用,因此,企业在治理过程中应该重视内部控制情况,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①。

(二) 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的时间效应在董事长层级的检验

根据前文的回归结果,家族企业的高管为职业经理人时,其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水平也较为低下,导致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但本文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无论是代理成本效应,还是声誉效应下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本文充分考虑高管的任职年限,不同的任职年限是否会对企业的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产生影响? 本文将董事长与 CEO 的任职年限加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第(1)列至第(4)列为检验董事长的任职年限对代理成本和内部控制影响的结果,数据表明当董事长为职业经理人时,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较差,代理成本较高,但是在考虑董事长的任职年限后,交互项 (*President × Pre_in*) 对内部控制的作用在 1% 的水平上正相关,对代理成本的作用在 5% 的水平上负相关,表明董事长的任职时间延长,促进了内部控制的完善,抑制了代理成本问题的加剧;第(5)列至第(8)列的结果为 CEO 层级检验任职年限对内部控制和代理成本的影响,其结果与董事长层级的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在 CEO 层级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具体结果见表 6。根据对回归结果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的确存在时间效应,即职业经理人的任职年限延长,可以促进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抑制代理问题的加剧。

六、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PSM 检验。为解决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表 5 两种效应在 CEO 层级的检验结果

	代理成本效应			声誉机制效应		
	(1)fee	(2)AC	(3)fee	(4)fee	(5)LnICQ	(6)fee
_cons	9.910 *** (0.14)	0.252 *** (0.04)	9.848 *** (0.14)	9.910 *** (0.14)	5.628 *** (0.25)	9.765 *** (0.27)
CEO	0.028 ** (0.01)	0.016 *** (0.00)	0.024 * (0.01)	0.028 ** (0.01)	-0.014 *** (0.00)	0.029 ** (0.01)
AC1			0.247 *** (0.07)			
LnICQ						-0.026 * (0.0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²	0.585	0.329	0.586	0.585	0.249	0.585
N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①由于篇幅限制相关结果未予列示,若需可联系作者。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测试。检验步骤如下:(1)分别以 *President* 和 *CEO* 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 (*Size*)、企业杠杆 (*Lev*)、公司成长性 (*Growth*)、总资产周转率 (*AT*)、总资产收益率 (*ROE*)、企业年龄 (*Age*)、审计意见 (*Op*)、四大审计 (*Big4*)、环境不确定性 (*eu*) 为特征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并计算倾向得分值;(2)依据倾向得分值,按照最近邻匹配(1:3)不放回抽样的原则进行配对;(3)将匹配后的样本删除不支撑共同区间假设的样本之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第二,替换变量。替换审计费用变量,本文以审计费用率 (*AFR*) 代替审计费用加入本文模型,以规避不同规模公司之间的可比性差异,同时削弱市场通货膨胀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①。

表 6 任职年限对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结果

	董事长层级				CEO 层级			
	(1)LnJCQ	(2)LnJCQ	(3)AC	(4)AC	(5)LnJCQ	(6)LnJCQ	(7)AC	(8)AC
<i>_cons</i>	5.627 *** (0.25)	5.621 *** (0.25)	0.263 *** (0.04)	0.258 *** (0.04)	5.628 *** (0.25)	5.620 *** (0.25)	0.252 *** (0.04)	0.250 *** (0.04)
<i>President</i>	-0.021 *** (0.01)	-0.039 *** (0.01)	0.013 *** (0.00)	0.019 *** (0.01)				
<i>CEO</i>					-0.014 *** (0.00)	-0.013 * (0.01)	0.016 *** (0.00)	0.022 *** (0.00)
<i>Pre_in</i>		0.000 (0.00)		0.001 ** (0.00)				
<i>President × Pre_in</i>		0.003 *** (0.00)		-0.001 ** (0.00)				
<i>CEO_in</i>						0.001 ** (0.00)		0.001 (0.00)
<i>CEO × CEO_in</i>						0.000 * (0.00)		-0.001 * (0.00)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²	0.250	0.252	0.328	0.328	0.249	0.250	0.329	0.330
N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6130

七、研究结论

家族企业高管为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可能具有双重机制。一方面,通过代理成本效应,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或者 CEO,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促使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加剧,增加审计师面临的固有风险,进而增加审计工作量,需要投入更高的审计资源,审计师要求被审计单位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通过声誉激励效应,职业经理人更加重视自己在任期间的业绩以及良好声誉,会更加重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进而减少由于内控失效带来的经营风险,完善的内部控制使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降低,因而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本文以我国 2008—2018 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家族公司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较高;同时,虽然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审计费用,但是由于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的高管其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内部控制相对较差,进而使审计费用增加,因此,本文认为代理成本效应在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里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在声誉效应的进一步检验中,我们发现内部控制水平越低,审计费用越高,该结论在高内控组结果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内部控制相对较差,代理成本问题较为严重,但是这种影响存在时间效应的作用,当高管的任职年限越长时,内部控制有所改善,不过代理问题也更加严重。

家族企业多由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创业者们建立,如今“创一代”纷纷步入花甲之年,在“创一代”谢幕之际,究竟是选择传统的代际传承模式还是聘用职业经理人对企业进行治理,仍需要时间的检验与利弊权衡。本研究为家族企业的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家族企业而言,聘用职业经理人时需关注因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成本增加等问题,但若选择合适的激励方式,缓解代理冲突,职业经理人也可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目标;对于监管机构而言,由于我国公司制度起步较晚、治理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建设情况仍有待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经理人实施自利行为提供了“寻租”空间,但完善的公司治理有助于企业发展,因此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等监管机构应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特别是内部控制运行存在的缺陷以及内部控制评价内容等方面。

由于本文只选择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本文只考察了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未探讨职业经理人对经营业绩、企业价值等的影响,若要更深入全面地研究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从多方面展开。

^①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参考文献:

- [1] 李新春. 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J]. 管理世界, 2003(4): 87-95 + 154-155.
- [2] 王明琳, 徐萌娜, 王河森. 利他行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吗? ——基于家族企业中亲缘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3): 144-157.
- [3] Faccio M, Lang L H P. The ultimate ownership of western European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2, 65(3): 365-395.
- [4]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76, 3(4): 305-360.
- [5] 周泽将, 宋淑娟. 海归高管与审计师选择: 代理成本的角色[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3): 42-51.
- [6] 田银华, 周志强, 廖和平. 动态三环模式与家族企业产权契约治理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7): 40-48.
- [7] 袁春生, 吴永明, 韩洪灵. 职业经理人会关注他们的市场声誉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舞弊行为的经验透视[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7): 151-160.
- [8]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26(2): 301-325.
- [9] 罗明琦. 企业产权、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14(7): 172-184.
- [10] 刘胜强, 林志军, 刘芳城, 等.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对企业 R&D 投资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5(11): 62-68 + 97.
- [11] Jiang F, Zhu B, Huang J. CEO's financial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3, 23(3):
- [12] 张利红. 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财会通讯, 2013(12): 21-25 + 129.
- [13] 蔡春, 谢柳芳, 马可哪呐. 高管审计背景、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J]. 会计研究, 2015(3): 72-78 + 95.
- [14] 李寿喜, 谌瑜. 企业内部审计如何有效参与的风险管理[J]. 经济导刊, 2007(1): 63-65.
- [15] 吕长江, 周县华.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05(3): 9-17.
- [16] 张雄林, 和金生, 刘洪伟. 职业经理人的声誉效应[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1): 29-32 + 42.
- [17] 高厚山, 张俊民. 市场化进程、独立董事声誉与盈余管理[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6(10): 46-51.
- [18] 辛清泉, 黄曼丽, 易浩然.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与独立董事监管处罚——基于独立董事个体视角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3(5): 131-143 + 175 + 188.
- [19] 张敏, 朱小平.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题与审计定价关系研究——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J]. 经济管理, 2010(9): 108-113.
- [20] 谢凡, 曹健, 陈莹, 等.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分析——基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强制实施的视角[J]. 会计研究, 2016(9): 62-67.
- [21] 盖地, 盛常艳.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3): 21-27.
- [22] 刘颖斐, 张小虎. 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6): 33-45.
- [23] 杨玉凤, 王欣, 曹琼.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沪市 2007 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审计研究, 2010(1): 82-88 + 46.
- [24] 申慧慧, 于鹏, 吴联生. 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 经济研究, 2012(7): 123-126.

[责任编辑: 刘 茜]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Audit Fees of Family Businesses: A Double Test of Agency Cost Effect and Reputation Effect

ZHU Rong, LI Xia

(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choice of successors in family business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ics of concern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family companies list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in 2008—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costs, i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impact on audit fees,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amily companies hiring professional managers on audit fe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amily companies that employ professional managers pay higher audit fees; there are both agency cost effects and reputation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but agency cost plays a leading role, and reputation effects can suppress the increase in audit costs;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family companies that employ professional managers have more serious agency problems and poorer internal control, and this is related to the senior management's tenure. The longer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s tenure, the better the internal control situ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gency conflicts also increase. Therefore, when choosing a professional manager as a successor, a family compan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gency problems it brings about, weigh the interest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and governance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Key Word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udit fees; agency cost effect; reputation effect; internal control; corporate governance; audit quality